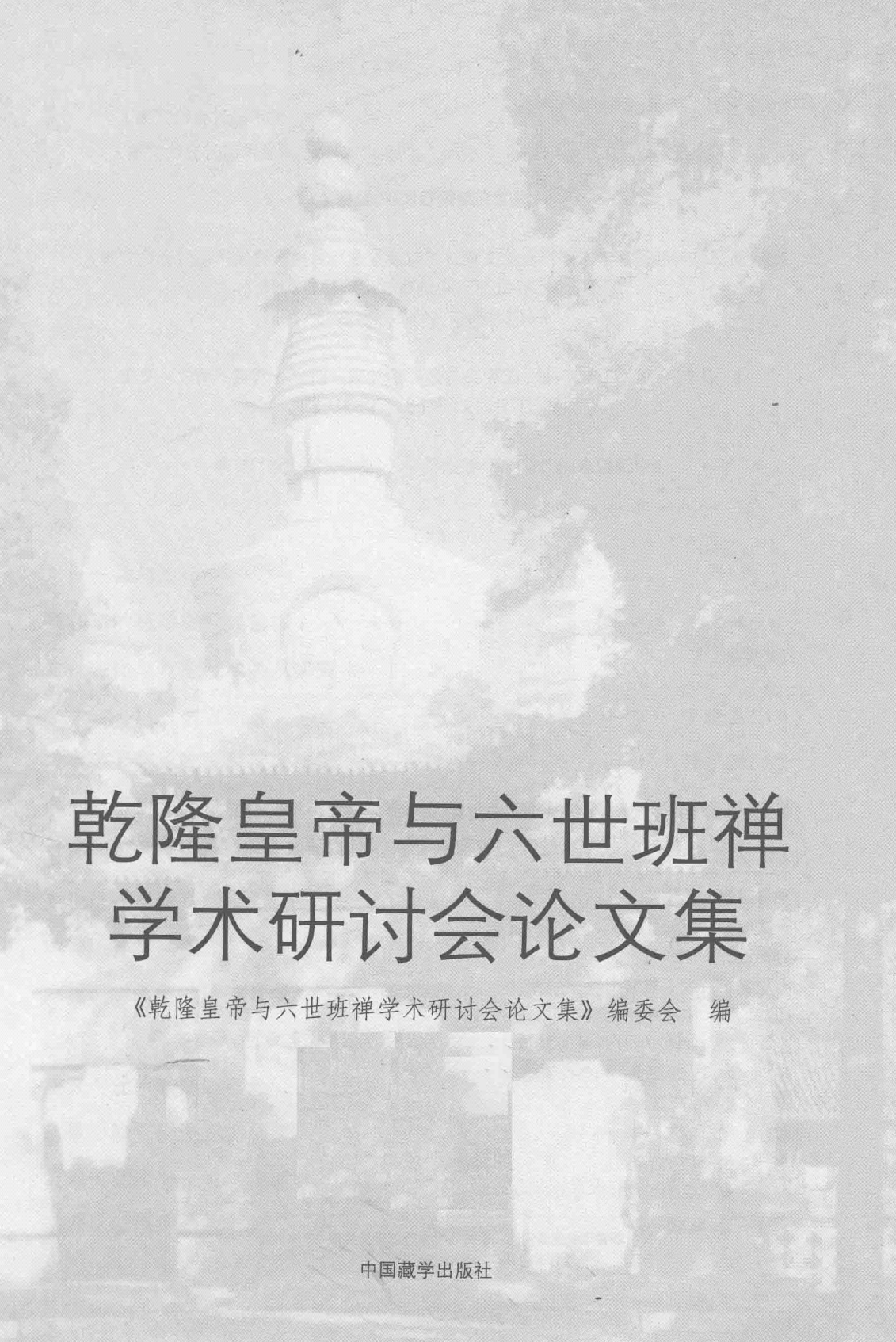




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目 录

六世班禅与西苑	于 宁(1)
雍和宫的班禅楼和戒台楼	王 艳(6)
六世班禅与乾隆互动关系研究	
——以《六世班禅传》为视角	王晓晶(19)
六世班禅觐见乾隆皇帝大事记	长倩平措(37)
浅谈六世班禅觐见乾隆皇帝的重要意义	多 多(54)
京承两地与六世班禅入觐直接相关的碑刻	安才旦(116)
六世班禅承德入觐前后	毕国忠(132)
六世班禅与圆明园	刘 阳(140)
六世班禅入觐的历史背景	许得存 文厚泓(146)
《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文本关系再探	孙伯君(158)
浅析明代宗教建筑彩画	李沙 任军(174)
从香山静宜园造园特点看昭庙的植物景观营造	李 博(181)
乾隆御题清净化城塔楹联解读	李德成(188)
清净化城塔牌坊题字考	宋筱清(193)

关于香山昭庙的三重要义	张渝丽 (198)
试论六世班禅“宿寺祈愿”对雍和宫历史地位所产生的影响	阿·巴德夫 (202)
对六世班禅进京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	陈庆英 (215)
六世班禅进京前后的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交流及影响	陈立健 (224)
试论六世班禅在北京香山昭庙的活动及其意义	周润年 张屹 (231)
论藏传佛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作用	周毓华 (240)
香山昭庙琉璃狮子初考	赵康 高云昆 (250)
论永瑑在六世班禅朝觐中的双重角色	柳 森 (261)
六世班禅爱国一生的光辉顶峰	高大伟 (274)
神秘的宗镜大昭之庙	袁长平/文 贾政/图 (276)
西夏文装藏咒语考	聂鸿音 (289)
宗镜大昭之庙设计的原理分析	贾 政 (301)
皇六子永瑑远赴岱海迎接六世班禅始末	郭美兰 (320)
六世班禅热河朝觐	彭陟焱 (333)
昭庙文化价值评价	傅 凡 (344)

* 本论文集的论文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编注

六世班禅与西苑

于 宁*

摘要 藏传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派系。清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自清朝入关前的皇太极在位时期就已经开始,“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也一直贯穿清朝始终。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四年即开始派人至西藏延请高僧。顺治皇帝于顺治十年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菩提瓦赤拉坦喇达赖喇嘛”,并颁下金册金印。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亦颁给班禅喇嘛金册金印。雍正在位期间经常召集藏传佛教高僧交流佛法。乾隆时期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给予了极大的礼遇,下旨在热河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在北京兴建了香山昭庙。并下令让永瑔及章嘉三世活佛陪伴六世班禅在北京的活动。在班禅于北京驻锡期间,曾在作为皇家内苑的西苑,也就是现在北海中的永安寺、白塔、阐福寺、大西天等宗教建筑中进行了献供礼佛活动,并于大西天侧驻锡一夜。这些在皇家内苑佛堂的佛事活动,是乾隆皇帝对班禅大师极大的尊崇,这种尊崇也是清王朝对待西藏政策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 六世班禅 西苑 章嘉三世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此时传入的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逐渐在当地形成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成为北传佛教的重要分支。13世纪前后,藏传佛教东传,得到了当时皇室宫廷的信奉,元朝皇室信奉藏传佛教萨

* 北京市北海公园管理处文化研究室

迦派，尊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帝师。明代皇室普遍接纳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佛教各教派，因此在皇宫中修建有各类的宗教礼拜场所，其中，藏传佛教尊像就被供奉在英华殿中。而后明代末年藏传佛教格鲁派自蒙古传入东北，后金及后来的清政权均信奉格鲁派藏传佛教，此后清王朝定鼎中原，对格鲁派传播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这也是清政府为了稳定和统一蒙藏地区所奉行的重要宗教政策。

清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自清朝入关前的皇太极在位时期就已经开始，“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也一直贯穿清朝始终。终清一代，清代统治者先后册封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转世系统，令其分掌前藏、后藏、外蒙古、内蒙古及京城的藏传佛教事务。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四年即开始派人至西藏延请高僧。顺治皇帝于顺治十年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菩提瓦赤拉坦喇达赖喇嘛”，并颁下金册金印。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二年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亦颁给班禅喇嘛金册金印。雍正在位期间也经常召集藏传佛教高僧交流佛法。

乾隆四十五年，正值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为祝寿亲至承德和京城觐见乾隆皇帝，为了迎接这位西藏活佛，乾隆皇帝耗费巨资修建了承德须弥福寿之庙以及北京香山静宜园宗镜大昭之庙，并下令让永瑆及章嘉三世活佛陪伴六世班禅在北京的活动。班禅于北京驻锡期间，曾在作为皇家内苑的西苑，也就是现在北海的永安寺、白塔、阐福寺、大西天等宗教建筑中进行了献供礼佛活动，并于大西天侧驻锡一夜。这些在皇家内苑佛堂的佛事活动，是乾隆皇帝对班禅大师极大的尊崇，这种尊崇也是清王朝对待西藏政策的一个侧面反映。

在六世班禅进京期间，有一位藏传佛教活佛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清王朝所册封的章嘉三世活佛章嘉·若必多吉。由于这位活佛在蒙古和西藏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并且又和乾隆皇帝关系密切，因此章嘉三世活佛一直在清政府对蒙藏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章嘉三世活佛向乾隆皇帝奏报，六世班禅希望在乾隆四十五年入京朝觐以恭祝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乾隆四十四年六世班禅自西藏动身，章嘉·若必多吉派遣侍从携带书信前往迎接班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皇六子永瑆和章嘉活佛于岱海迎接六世班禅，并颁赐乾隆皇

帝的诏书和赏赐。此后皇六子和章嘉活佛先奔赴热河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迎接的情况，七月二十二日，又于热河避暑山庄迎接班禅，并陪同其朝觐乾隆皇帝，此后班禅大师在热河和北京的参观、游览、拜谒活动均由章嘉活佛陪同，觐见期间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的祝寿辞和答辞均由章嘉活佛进行翻译。此外，章嘉活佛还代表乾隆皇帝向班禅赠送了雍正时绘制的画像和其他珍贵的礼物。而后六世班禅在西黄寺染病直至圆寂，亦是由章嘉活佛一直在身边陪护，直至六世班禅圆寂后，其后事亦是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各种仪式，并且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将六世班禅灵塔护送至清化府。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朝觐期间，在乾隆皇帝的安排下游览了位于北京的几个皇家园林。《永瑤奏报班禅游览紫禁城北海颐和园等处情形片》中详细地记述了六世班禅在西苑活动行程的详情：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本月……

十四日，前往雍和宫，柏林寺、永安寺礼佛，登塔祈祷。游览悦心殿登出，乘太液香奁船，至大西天礼佛后，即住大西天迤西所建之楼。

十五日，从大西天乘船，至万山殿礼佛，令习经小和尚等念咒令班禅额尔德尼听，继至阐福寺等寺庙瞻拜，又在广慈寺供塔齐勒一千，献哈达、珊瑚数珠等物，念吉祥经祈祷，而后返回黄寺。^①

根据史料记载，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苑的行程是自永安寺而上，至琼岛顶端白塔进行佛事活动，而后拾级而下至悦心殿游览，再乘船至大西天礼佛，并驻锡在大西天西侧阁楼之中，第二日自大西天先至万山殿礼佛，再回到阐福寺进行参拜。由此可见，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苑的行程有近二日之久，根据相关档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抵京后，除了常驻西黄寺外，还游览了包括西苑、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雍和宫等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期间驻锡过的皇家寺院包括有西苑大西天、万寿山法藏楼和慈福楼、南苑德寿寺、雍和宫、圆明园清净地和同乐园，以及香山宗镜大昭之庙。而西苑大西天应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278页。

是六世班禅在皇家御苑中的皇家寺庙驻锡的唯一例子。永瑢的奏片中记载，“此数日，班禅额尔德尼游览。甚是赞赏，所有随行喇嘛，亦皆欣览。再，凡行经各供佛处、御座，班禅额尔德尼俱合掌讽念吉祥经；献哈达及曼扎、螺号。班禅额尔德尼出行，臣等均派护军统领等导引。住大西天、万寿山时，俱照住清净地之例演戏，并派捕役巡查。所食之项，应备物件，均照原定数额备办”。^①由此可见，清廷对于班禅大师行程和住宿的接待极为重视。

西苑园林之中也保留有与六世班禅相关的遗迹，乾隆四十二年，六世班禅通过章嘉活佛将一副《七佛番轴画》进献给乾隆皇帝。章嘉活佛将这七尊佛位的典故都一一给乾隆皇帝解释清楚，因此乾隆皇帝将《七佛番轴画》刻制在石碑上，并修建了碑亭，也就是现在位于大慈真如宝殿后的七佛偈碑亭。该亭为八角攒尖式亭，内设八面七佛碑，七面为线刻佛像，分别为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及释迦牟尼佛，第八面为碑记。碑面呈长方形，有边框，上下雕双龙戏珠，左右为单龙戏珠。内框之上框为七珍，左右框为八宝。框内上部正中为一佛，居莲座。佛左右为二神足像，下方近底框处，为佛之父母及二侍者像。七佛脚下均刻楷书藏文，边框上部有汉满蒙藏文佛偈。

奏片中提到的阐福寺，与章嘉三世活佛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有着这样的记载：“大皇帝在京城的后街兴建了一座三层佛堂，内塑一尊圣者千首千臂白伞盖佛母像，当作社稷的保护神，由章嘉国师亲自指导塑造，完成后举行了开光。每遇节日，由上师僧众举行献供仪轨。又在佛殿右面修建了一座九层佛塔，建至第八层时，从天空落下一团火，烧毁了整个佛塔，以后在此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名叫‘大西天’的印度式佛堂，由章嘉国师举行了开光典礼。”^②这段材料中所记载的“三层佛堂”“大西天”，均位于北海阐福寺北侧的万佛楼建筑群中，章嘉活佛作为与清代皇室关系非常亲密的藏传佛教大师及掌印喇嘛，被乾隆予以接待班禅大师的重任，这也是因为章嘉三世活佛在蒙古和西藏具有很高的威望，由于他对当时清廷和西藏及蒙古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在乾隆时期西藏地方事务中，章嘉活佛经常根据西藏当地的情况，向乾隆皇帝积极地谏言并且亲自多次奔赴当地

^① 《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第278页。

^②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20页。

进行各种宗教政治活动，因此受到了乾隆皇帝的信任和重视。

自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受到了广泛的信奉。清代对蒙古和西藏地区更是优待，这种优待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给予当地政治宗教领袖丰厚的赏赐，更在政治上予以优待，试图以怀柔的方式使两个地区归附清廷，以保证西北边界的长治久安。乾隆皇帝御笔《喇嘛说》中写到了当时清廷对藏传佛教的态度：“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迨敬番僧也……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从这段话来看，乾隆皇帝创立的“金瓶掣签”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尊重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同时，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藏传佛教流行地区的控制，不仅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权威，也维护了西藏和蒙古地区的稳定 and 国家的统一。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西北的安定关系到整个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清政府尊奉藏传佛教、册封宗教领袖，以期加强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的向心力。此外，乾隆在《喇嘛说》中所表述的宗教政策，表明了清代高宗及之前各位皇帝的西北政策都选择了扶持黄教，借助宗教来安抚信奉黄教的蒙古王公和百姓。乾隆皇帝认为其在七十岁万寿盛典汇集内外藩属之时，六世班禅进京贺寿的事件，是当时安抚西藏、宣扬国威的重大成功，他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写道：“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以观华夏之振兴黄教，抚育群生、海宇清晏、民物敕宁之景象。”这正是乾隆皇帝所自豪的“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的体现，说明了清初宗教政策得到良好的贯彻并收到了巨大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雍和宫的班禅楼和戒台楼

王 艳*

摘要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世班禅大师自西藏起程进京为乾隆皇帝庆祝七十寿辰，为此乾隆皇帝拟旨在雍和宫改扩建了两座殿堂，专供大师使用，即讲经传法的戒台楼和休息使用的班禅楼。本文以《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国朝宫史续编》《清朝通史》等档案为史料，研究考证了戒台楼和班禅楼改扩建时间、主持施建者以及改扩建细节等诸多内容。施建过程中乾隆皇帝多次询问并提出两座殿堂改扩建意见，巧妙采取以“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视，达到民族和睦、边疆稳定、领土完整的政治目的。两座殿堂的敕建，其背后代表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当初兴建时期的使用功能，彰显了乾隆皇帝在处理西藏问题上高瞻远瞩的治藏理念。

关键词 乾隆帝 六世班禅大师 班禅楼 戒台楼

雍和宫是清朝的皇家寺院和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中心，曾备受乾隆帝及其后世历代帝王的重视、推崇和支持，并以规模宏大、学经组织完备、驻锡高僧众多、设有“金奔巴瓶”和实施“金瓶掣签”制度而闻名，在内地藏传佛教发展史及中央与蒙藏地区关系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重要影响。历史上，三世章嘉活佛、六世班禅大师、十世班禅大师等众多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弘传佛法、护国利民的身影。其中，雍和宫的班禅楼和戒台楼是专为迎接六世班禅大师进京改扩建而成，其敕建既彰显了乾隆皇帝对藏

* 北京雍和宫管理处接待办公室副主任

传佛教及其领袖人物的重视与厚爱，也凸显了六世班禅大师爱国爱教的高尚情操与崇高历史地位。本文拟根据有关档案史料，对这两座殿堂的建设时间和过程进行考证，以期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班禅楼和戒台楼概况及改扩建的历史背景

班禅楼和戒台楼位于雍和宫七进院落中第六进院落，坐落在法轮殿东西两侧，为一组建筑风格相同且对称的汉式重楼歇山顶式楼阁，三座建筑处于东西方向的同一水平线。由于班禅楼和戒台楼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迎接六世班禅改扩建而成，受当时院落面积所限，两座楼阁外围的大理石台基与法轮殿台基仅有1.1米距离，由两条狭长通道联系起的三座建筑，巧妙地将汉藏文化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这组建筑群独有的魅力。仔细探究，不难发现，目前雍和宫对外开放的诸多殿堂中，唯班禅楼和戒台楼为非礼拜殿堂，由此人们不禁对两座楼阁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兴趣。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希望通过与西藏建立商业关系，在拉萨设立使馆，达到入侵西藏的目的，他们的别有用心遭到六世班禅的断然拒绝，此举深得乾隆皇帝赏识，自此六世班禅产生了朝觐乾隆皇帝的愿望。当时八世达赖喇嘛尚幼，六世班禅为实际上的格鲁派宗教领袖，被认为是稳定藏族及蒙古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加强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世班禅请章嘉国师代奏，要求进京朝觐乾隆皇帝，并为乾隆皇帝庆七十寿辰，乾隆皇帝十分高兴，欣允其请，于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下谕：“即照所请……允其前来。”^①又于初九日追加谕旨：“是年朕万寿月即驻热河，外藩毕齐，班禅额尔德尼若于彼时到热河，最为便益，已谕令于热河度地建庙，备其居住。”^②

热河须弥福寿之庙便于此时开工兴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六世班禅在此居住一个多月后，继续前行，率大队人马赴京城再次谒见乾隆皇帝。

① 周远廉：《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546页。

② 周远廉：《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下），第546页。

为迎接六世班禅大师，乾隆皇帝在北京特为其兴建或改建了香山昭庙、南苑德寿寺、北郊西黄寺和东城雍和宫班禅楼、戒台楼。而今雍和宫这两座楼宇依然如 230 多年前完美、雄壮地矗立于法轮殿两侧，以其独特秀美的风姿吸引着中外游客、信众的参访。

那么，雍和宫这两座楼宇到底因何而改建？于何时动工和完工？又是由谁主持设计与建设施工的呢？相关记载和研究很少，本文以《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国朝宫史续编》等档案和史料为基础材料，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研究。

二、班禅楼、戒台楼改建和完工时间

（一）班禅楼的改建时间

《国朝宫史续编》记载：（法轮殿）左右山殿各三楹。西为戒坛，乾隆四十四年高宗纯皇帝命仿热河广安寺戒坛式，改建方坛三层，每层环以石栏，列佛像。东为药师坛。是年并改建重楼，上下各五楹，与戒坛相配。^①

上述档案提示我们，班禅楼和戒台楼是分别在原来药师坛和戒坛基础上改建的。由于班禅楼和戒台楼分别位于法轮殿东侧和西侧，从位置上来说，这两座楼宇也叫东耳殿和西耳殿。

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八月初八日英廉与和珅上疏奏折：“查本年正月内刘浩遵上曰：将雍和宫地盘样，呈览奉。上曰：东耳殿内坛城，着挪在外间，庙中安奉。”^②

依据此奏折得知，为迎接六世班禅来雍和宫安禅礼佛，乾隆帝于四十四年正月即开始考虑对东耳殿进行改建，此时离“允其前来”谕旨和热河须弥

^①（清）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514 页。

^② 邹爱莲、鲍洪飞、韩永福主编：《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 年，第 262 页。

福寿之庙开工相差一个月左右。而另一道奏折帮我们确定了东耳殿改建的大致时间：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来说：太监鄂鲁里传上曰：大西天、雍和宫、西皇寺、万寿山、昭庙应挂拉古里、壁衣，着造办处成做。钦此。^①

雍和宫东耳殿明间安拉古里^②

二月初十日乾隆皇帝下谕，令造办处对京城五座寺院殿堂进行内部装饰，除大西天外另四座寺院均为接待六世班禅的寺院，自这天开始，乾隆皇帝已将这些接待寺院的内部装饰提上议事日程，而雍和宫特别注明的是“东耳殿”，由此推断，东耳殿改建时间开始于乾隆四十四年正月至二月初十日之间。

具体负责东耳殿改建工程的是以清内务府大臣刘浩为首的几名官员。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为庆乾隆六十大寿，刘浩曾受命乾隆皇帝为其重修岱庙，他圆满完成了对原有殿宇、廊庑、佛像等的重修重建工程，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在改建庙宇方面可谓经验丰富，十年后恰值乾隆皇帝七十寿辰，刘浩再次奉旨改建雍和宫东耳殿这一重大工程。

（二）戒台楼的改建时间

恭敬查本年六月二十日奉，上曰：雍和宫戒台甚小，照广安寺定准戒台烫样改造。^③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开始关注位于法轮殿西侧的原有戒台楼的进一步改建，其与东耳殿改建时间相比，晚四五个月。

史料记载，戒台楼改建工程是由和尔经额主持完成的。他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参与了热河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期间担任了修建这座寺庙的

①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39页。

②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39页。

③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76页。

部分领导工作。

而自东耳殿改建之初，乾隆皇帝即下谕旨对班禅楼和戒台楼制作内挂装饰，也就是说两楼的改建和楼内的装饰是同步进行的，装饰任务由员外郎四德、五德、催长大达色、太监鄂鲁里等人承办。

据《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记载，自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十至九月二十六日，期间由大臣选好做内饰的料子，呈乾隆皇帝过目后，交由大臣依料子不同质地和尺寸，逐一做成东耳殿拉古里、壁衣和顶幔。这些由内务府提供的料子有红黄石青回子绸三匹、绣鹤灰色毡一块、绣鹤石青毡一块、黄地红花绒毡一块、裁绒毡一块、金花缎一匹，金银花缎一匹、交织锦倭缎夹帐幔一件、金丝缎帐幔一件。由此可见，东耳殿的内部装饰与工程改建是同步进行的。

（三）班禅楼和戒台楼改建完工时间

在我们探讨两座楼阁于何时修建完工的答案之前，先来看看位于香山昭庙的修建情况。《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是这样记载的：“香山昭庙（修建时间）却从未在旨意中公开提及，唯一可以显示香山昭庙与承德须弥福寿庙为同时期开工建造的证据，仅是有关昭庙之都罡殿等烧炼金饰头所需用金叶的奏折。”^①再则，“（昭庙）时间上比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准备金叶的奏折日期晚了大约三个月，可以说这两座寺庙大致是在同一时间段，即乾隆四十四年开始修建”。^②可见，昭庙的修建未如须弥福寿之庙那样大张旗鼓地对外宣称修建的起止时间，只能从部分档案中获得一些推测和启示，相比须弥福寿之庙而言，香山昭庙的修缮显得低调得多。无独有偶，雍和宫两座殿堂改建时间，在相关历史档案中，也未有明确记载。所幸，我们可从几道奏折得以窥探其大致完工时间。

班禅楼和戒台楼的改建奏折是由清朝大臣英廉与和珅呈给乾隆皇帝的，由此推断两座楼阁的改建是在这二位大臣的监管下完成的。史料记载，英廉是内务府镶黄旗人，举人，历任道员、护军统领、布政使、户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四十五年升任大学士、户部左侍郎、内务府总管大臣。他于乾隆三

^① 王晓晶：《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

^② 王晓晶：《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第158页。

十二年（1767年）同清廷另外二位官员共同完成了热河普陀宗乘之庙的修缮，这座占地22万平方米的寺庙，耗资巨大，历时四年多修建完成。时隔十二年后，恰逢六世班禅进京，需改扩建雍和宫班禅楼和戒台楼，乾隆帝又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英廉主管。和珅在乾隆年间历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都统、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

英廉与和珅分别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初八日和八月二十五日上疏东耳殿和戒台楼改建过程的奏折，又于八月初二日和九月二十六日上疏完成两座殿宇内部装饰的奏折，由此分析得出，两座殿宇大致于八月至九月间完成主体部分的改扩建工程。

两座楼阁建成初期，乾隆皇帝于十月初八日阅后由太监厄勒里呈上的一座欢门幡烫样，责员外郎四德、五德选择由内库提供的红黄绿石、青紫酱色锦缎，做成三堂欢门幡，挂于东、西耳殿。欢门幡是佛像前悬挂的绣满飞天、莲花、瑞兽和花卉等图案的锦幛绣幔。

综上所述，班禅楼大约用6—8个月改建完工，戒台楼大约用两个多月。位于热河的须弥福寿之庙，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历时一年四个月完工，班禅楼和戒台楼占地面积为656平方米，两座楼阁在几个月内完成改建任务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班禅楼和戒台楼改建过程

（一）班禅楼改建过程

乾隆皇帝多次询问雍和宫两座殿堂的改建情况，亲自设计建筑结构和布局，仅东耳殿主体建筑的重要部位，就曾三次下旨，提出了具体详细的改建意见，彰显了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特殊礼遇和恩宠。

上曰：东耳殿内坛城，着挪在外间，庙中安奉。着刘浩查勘、挪移。其东耳殿后金柱中间安壁板一槽，悬挂壁衣，设座位，上安

拉固里。^①

奏折中提到的金柱指古建筑物中支撑梁架的柱子，明间指建筑物内正中一间（两根柱子之间为一间）。壁衣指用织锦或布帛做成的装饰墙壁的帷幕。乾隆皇帝命刘浩将供奉在东耳殿内的药师坛城挪到雍和宫其他殿堂供奉，东耳殿后金柱中间安上一槽壁板，墙壁挂上帷幕，殿堂正中间摆上一张宝座，宝座上安拉固里，以供六世班禅使用。

正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详细审阅了由大臣呈上的东耳殿一楼烫样。所谓“烫样”就是自清朝康熙年间到清末，为了使皇帝能直观了解建筑物样式，采用纸张、秫秸和木头等材料加工而成的建筑模型，加工过程中因使用特制的小型烙铁熨烫，遂将这种建筑模型称作“烫样”。清朝皇家建筑均由“样式雷”承办，以1/100或1/200比例制作完成的烫样呈皇帝御览。乾隆皇帝阅后提出了具体改建东耳殿二楼的意见：“上曰：两山方窗不要，两次间欹窗挪在金里，安明间外廊内，添进深隔扇各二扇，余照样准做。”^②

乾隆皇帝特别指示两座山墙的方窗不要，两次间的欹窗挪在金柱的位置，以一楼殿内金柱为标准，并增设外廊道，开二扇隔扇（门），其他照样去做。

第二天即二十九日，大臣便将做好的二楼烫样呈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阅后非常满意，指示“照样准做”，最后嘱咐设在明间的座位交由内务府去办理。

主管大臣接旨后，来到雍和宫东耳殿进行实地勘查，勘查结果如下：

雍和宫东耳殿三间。明间后金添安壁子一槽，二次间添安飞罩二槽，前金明间添安飞罩一槽。二次间前檐欹窗挪于金内安装，上截添安带子板。拆砌欹墙，补埽地面。进深廊内添安隔扇二槽。外檐柱木装，修光朱红油。内里换糊窗心，糊饰顶隔壁子、墙垣等项。除高丽纸、蓝纱行取应用外，估需银一百八十三两八分五厘。^③

东耳殿为面阔三间的建筑，一楼明间后金柱安装一槽壁子板，前金柱安

①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62页。

②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62页。

③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62页。

装一槽飞罩，两边次间安装二槽飞罩。二楼两边次间前檐枋窗安装在金柱以里，上半截安装带子板。拆砌枋墙，补埽地面。走廊里安装二槽隔扇。使用朱红油漆木制檐柱。裱糊窗户心、天花板等处。除了领取高丽纸、蓝纱外，估计需要一百八十三两八分五厘。

此奏折后半部分，还详细记载了有关西黄寺部分殿堂内部装饰问题。包括达赖喇嘛楼内部要悬挂壁衣、安拉固里，西北转角一间的装饰改造，西角门新添建筑物所需银两等事宜。

经过六个多月的修建，班禅楼建成一座九脊重檐歇山顶式的二层建筑。上层为“明三暗九”式，五间带廊，下层是“明五暗二十五”式，不带廊，两层合计三十四间，按照清式建筑，应属于“九五坛楼”，而“九五”喻作皇帝之尊贵。当年，乾隆皇帝还特将原陈设在戒台楼内的“三台宝座”移置于班禅楼内，专供六世班禅使用。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十三日，六世班禅在皇六子永瑤及其随员的陪同下经安定门，初次来到雍和宫，沿护法殿、三怙主殿、永佑殿、法轮殿礼敬献供。之后来到新落成的班禅楼，向僧众传授《兜率上师瑜伽论》《大慈悲论》及《三时怙主陀罗尼经》，并为雍和宫僧人摩顶赐福。^①十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大师率随从再次莅临雍和宫参加祈愿大法会，期间特为这座楼宇举行了开光仪式。^②

（二）戒台楼改建过程

《国朝宫史续编》记载：（法轮殿）左右山殿各三楹。西为戒坛，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高宗纯皇帝命仿热河广安寺戒坛式，改建方坛三层，每层环以石栏，列佛像。^③

由此可知，原来位于法轮殿西侧的是一座面阔三间的戒台楼，与东耳殿相对应。乾隆皇帝认为如若供六世班禅使用，面积有点小，需要重建一座新戒台楼。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对大臣说：“雍和宫戒台甚小，照广安寺定准

① 黄崇文：《历代班禅与雍和宫》，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② 黄崇文：《历代班禅与雍和宫》，第27页。

③ （清）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14页。

戒台烫样改造，如房间窄小，即将现在房间另行改造，量势酌拟画样。”^①

乾隆皇帝提到的这个广安寺，位于热河。此寺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即皇太后祝八大寿而建，但庙落成后，太后已逝。此庙后来成为乾隆同蒙古王公贵族举行法会的场所，在笼络崇信格鲁派的蒙藏贵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戒台楼为广安寺主体建筑，其楼宇面阔七间、进深七间，外观二层，而二层实为立木架层，整体却为单层建筑，戒台楼内有一大型戒台，分三层供奉佛像。

五天后即六月二十五日，原副都统和尔经额到雍和宫戒台楼内进行实地考察，察看结果如下：

现有戒台殿三间，内木戒台一座，甚小。今将此殿三间拆卸，并将西院墙拆去，足敷盖造面宽五间、进深五间殿，一座。内照热河广安寺奏准戒台样成造，甚属如式。谨将查看改造戒台绘图贴说，由报，先行具奏等因。^②

其大意是说：现在的戒台殿为面阔三间的建筑，殿内有一座很小的木质戒台，现在可以将这座面阔三间的戒台楼连同西院墙一并拆除，建成面阔五间的楼阁，里面的戒台仿照承德广安寺内的戒台样式去做。从这点看，戒台楼由原来面阔三间改为面阔五间的建筑，并拆除西院墙，与其说是改建戒台楼，不如说新建一座规模比广安寺戒台楼小，而比原有戒台楼大的新楼阁更为贴切。

四天后即二十九日，大臣将实地勘查后拟定的戒台楼改建方案上报给乾隆皇帝，得到乾隆的认可。

乾隆皇帝对两座楼阁的修建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建筑结构上，还对安奉在戒台楼内佛像文字的书写，一一过问，提出要求，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接待六世班禅的每一个细节都关怀备至，可谓事无巨细。

八月初六日，经和尔经额将雍和宫改建戒台烫样、神像画样差

①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76页。

②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影印本）第十一册，第276页。